

1927—1937年上海现代儿童体育的发展及启示

刘媛¹, 刘合成²

(1.聊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东 聊城 252059; 2.聊城大学 财务处, 山东 聊城 252059)

摘要: 为探讨在国家民族危亡时期现代体育对于儿童和国家解放的特殊意义, 运用体育学、历史学相关理论, 对1927—1937年上海现代儿童体育发展进行回顾分析, 结果发现这一时期尽管国家处于危亡之中, 但西方现代体育成为上海市民生活的重要内容, 现代儿童体育蓬勃发展, 儿童广泛参与学校体育和社会体育活动, 且贯穿在儿童日常生活中。现代儿童体育既满足了时代需求, 也获得了自身发展, 为今天儿童体育的发展提供现实启示: 儿童体育应尊重儿童成长特性, 活动方式应灵活多样, 儿童体育反映时代诉求, 实现体育和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

关键词: 体育史; 儿童体育; 儿童生活; 国家解放; 1927—1937年; 上海

中图分类号: G80-05; G6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7116(2016)01-0046-07

Modern children sports development in Shanghai between 1927 and 1938 and inspirations therefrom

LIU Yuan¹, LIU He-cheng²

(1.Marxism Institute, Liaocheng University, Liaocheng 252059, China;

2.Finance Department, Liaocheng University, Liaocheng 252059,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probe into modern sports' special meaning to children and nation liberation in a period when a country/nation was in peril, the authors reviewed and analyzed modern children sports development in Shanghai between 1927 and 1937, and found that although the nation was in peril in this period, western modern sports became an important content in the life of citizens in Shanghai, modern children sports were booming, children participated in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ocial sports activities extensively and throughout their daily life. Modern children sports have not only satisfied epochal needs, but also acquired its own development, and provided realistic inspirations to children sports development today; during children sports development, we should respect children growing characteristics, while ways of activities should be flexible and diverse; children sports reflect epochal demands, and realize the benign interaction between sport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sports history; children sports; children's life; nation liberation; 1927—1937; Shanhai

鸦片战争之后, 中国从“天朝上国”走向世界舞台的边缘, 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 中国人开始“师夷长技”以挽救民族危亡, 在西学东渐的大潮中西方体育来到中国。自19世纪40年代开埠以后, 上海以自身优越的地理位置, 始终处在中西方文明交汇碰撞的最前沿, 至20世纪20、30年代, 通过留学生引入、租界示范、大众传媒等各种途径, 西方现代体育成为上海市民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现代体育是

西方工业文明、机器大生产的产物, 在中国, 现代体育是“舶来品”, 是相对于传统体育而言的。

1927—1937年国民党在中国建立起相对稳定的政权, 在城市推行改革和发展经济, 这一时期是上海城市从传统向现代迈进的社会转型期, 也是中国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10年, 经“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 半殖民地的处境和现代人才的缺失, 始终是制约上海发展的重要因素。随着社会的发展, 人们意识

收稿日期: 2015-03-23

基金项目: 2014年度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青少年研究专项(14CQJ14); 2008年度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Y2008C180)。

作者简介: 刘媛(1981-), 女, 讲师, 博士, 研究方向: 中国近代体育史。E-mail: liuyuan1981917@163.com

到儿童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倡导发现和解放儿童，以期最终实现城市发展和国家独立。1932年上海在全国首倡并试行“四四儿童节”；1934年又呈请设置“儿童年”。^①在这一过程中，现代体育成为发现和解放儿童的重要方式，也成为救亡图存的途径之一。

1 1927—1937年上海现代儿童体育发展的契机

1.1 现代儿童体育演进的新思维

1) 传统儿童观念与儿童体育的缺失。

长久以来，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人们将儿童看作“小一号的成人”，忽视其自身生理和心理特征，并且认为儿童是家庭或家族的私有物品，认识不到儿童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受封建专制和伦理纲常的影响，传统社会历来忽视儿童活泼好动的天性，“凡行步趋跑，须是端正，不可疾走跳踉”，儿童的一举一动都被加以限制，失去了原本属于他们的自由与欢乐。在儿童教育中重文轻武，注重“修身养性”，重视德育和智育，较少注意甚至无视体育、美育等，“课程里根本没有运动或体育这个项目。小孩子们不许拔步飞跑，他们必须保持‘体统’一步一步慢慢地走”^①。清末一名英国军官参观了洋务运动创办的新式学堂福州船政局后认为：学堂里的学生“从智力上来说和西方学生不相上下，不过在其他方面则远不如后者，他们是虚弱孱小的角色……从来不运动，而且不懂得娱乐。”^②

对于儿童游戏，中国社会素来主张“玩物丧志”、“勤有功，戏无益”，历来忽视运动和游戏对儿童成长的积极意义，儿童体育或为棋类、九连环等益智类游戏，或为踏青、放风筝、打秋千等，以健身养生为主要目的。清朝末年的1906—1907年，对于儿童，始有教授“游技”之发现^③。传统儿童体育建立在封建小农经济基础上，缺乏竞争性和开放性，儿童体育场地缺失，竞技类体育较少，儿童的身体和活动受到礼教束缚，女童由于裹脚不仅身体遭受摧残，也丧失众多体育运动的机会，体育促进儿童身体发育和心理健康的功效较少得到体现。

鸦片战争以后，传统体育由于受到来自西方体育的冲击，而造成发展轨迹的中断^④，现代体育开始在中国待以传播，儿童参与现代体育活动能够促进身心成长。

2) 儿童身心解放与现代儿童体育在上海的开展。

一直到民国时期，人们的“儿童观”才开始发生改变，在突出强调以个体为本位的五四运动中，儿童作为生命主体的地位被发现，人们意识到应当将儿童从封建礼教的束缚之下解放出来，正确认识和对待儿童的特性，不能将成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方式强加到儿童身上，需要有符合儿童年龄特征的物质和精神产

品满足儿童身心发育。随着新文化运动时期“救救孩子”的呼声愈来愈高，打破传统、解放儿童、认知儿童成为先驱们一致的共识。1919年，鲁迅发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提出“幼者本位”的思想，主张解放儿童、尊重儿童的独立性、自主性，建立一种平等、民主的亲子关系。

几乎与此同时，西方现代儿童教育理论传播到上海，影响较大的是美国教育家杜威的“儿童中心论”（儿童本位主义），他主张学校即社会，教育即生活，儿童培养应以儿童为中心并和社会需求挂钩，使教育与现代生活，与生活实用紧密结合在一起。1919年4—5月杜威访沪，宣传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杜威重视“游戏”对儿童的教育意义，主张体育和德育、智育并重，在20、30年代产生重要影响，很长一段时间内上海谈及儿童教育“言必称杜威”；1925年美国儿童教育家伯克赫斯特访沪，提倡培养儿童动手能力和进行技能训练；1931年美国儿童教育家华虚朋夫妇访问上海，上海市教育局、中华儿童教育社等22个单位、团体接待，在儿童训练等方面进行了交流。这些儿童教育理念承认体育在儿童成长中的积极作用，反映出时代所需的理论要求，著名儿童教育家陈鹤琴、陶行知等主张发现儿童、解放儿童，陶行知提出解放儿童的眼睛、头脑、双手、嘴巴、时间、空间等。

在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背景下，儿童被动接受传统思想和礼教的约束与规范，身体和心理长期处于不自由的状态，现代体育运动成为解放儿童的有效途径，解放儿童就是尊重儿童的身体发育特性，将儿童的身体从传统束缚中解放出来，主动进行现代体育运动，促进自身生理健康成长和发育；解放儿童就是尊重儿童的心理特性，将儿童的思维和心灵从压抑之下解放出来，从事现代体育运动并获得快乐，还原活泼好动的天性；解放儿童还表现在教养儿童的方式，从传统成人意志占据主导地位转向以儿童为中心。

上海积极倡导儿童体育运动，推广儿童玩具和教具，体现出作为生命个体的儿童解放。在开展儿童现代体育运动时，从儿童自身的生理和心理特点出发，尊重儿童独特的生理特征和心灵世界。在幼儿园、小学内均设有游戏课或体育课，还有课外活动，满足儿童活泼好动的天性；在儿童游乐场的设置方面，192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董修甲所著《市政新论》，介绍1920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刘易斯敦市儿童游乐场的设计图，该游戏场已认识到男孩、女孩运动能力及兴趣的差异，为他们分别提供篮球场和游戏器械等设施，男孩活动区域还专设了棒球场，所有场地尺寸较成人均相应缩减，为此后儿童游乐园等的设立提出适合儿

童自身特点等要求。据此,上海儿童体育的开展也充分考虑到儿童的自身特性。20世纪30年代初,上海市政府于江湾新区修建并开放了第一公园,“在园之西南隅,为游人出入之所,儿童体育场设焉”^[5]。上海各大游乐场如先施百货公司游乐场、永安百货公司游乐场都设有儿童乐园或儿童世界等,专供儿童进行体育游戏;为方便儿童体育运动,上海市多个简易体育场就直接设置在各个小学内;政府和社会团体还组织了各种类型的儿童运动会,号召儿童进行体育游戏和体育运动。

1.2 现代儿童体育发展的时代诉求

1) 现代儿童观念与体育救国思潮。

儿童对于国家、民族、社会有着特殊意义,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儿童问题开始与民族命运联系在一起。民国时期人们愈加重视儿童问题,鲁迅^[6]说:“看十来岁的孩子,便可以逆料二十年后中国的情形。”周作人认为:“盖儿童者,未来之国民。”^②旧有的从属于封建家族的儿童观,由此被新型的国家民族的儿童观所替代。1937年商务印书馆印行了《儿童保护》,提到“儿童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健全的国家,建筑健全的人民,要使未来的国民品质优良,该在成人以前的儿童时代予以培养训练。”^[7]关注儿童身体的健康和健全,有效途径之一就是增加儿童体育锻炼。

近代以来,中国人被称为“东亚病夫”,中国积弱的原因也被归结为国民身体的病态和孱弱,为摆脱亡国灭种的危机和“东亚病夫”的耻辱,有识之士在探索救国、强国之路的过程中,逐步意识到应先有身体健全之儿童,始有健全的国民和国家,提出“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儿”,儿童身体的存在和强壮被认为是社会进步和国家富强的基础。自19世纪60年代伊始,洋务运动的新式军队和新式学堂中出现“洋操”,到20世纪初期,各级学堂均习“体操”,历经40余年,体育最终被看作“强国强种”的有效途径,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再到20世纪20、30年代,体育救国、体育强国思潮得到广泛认可,儿童体育因其特有的救亡图存的功效,获得民众认可,伴随着西方坚船利炮到来的现代儿童体育和建立民族主义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最终要满足国家独立的时代诉求,以实现“体育救国”。

冲破封建家庭子女观的藩篱,儿童被看做国家和民族的未来,现代儿童体育运动对于半殖民地中国探寻抵御外侮的途径具有特殊意义,通过体育运动,不仅使国民拥有强健的身体,有助于中国摆脱半殖民地的困境,还可以拥有强健、进取的精神,为中华民族

学习西方科技、从封闭走向开放等产生积极影响。

2) 体育救国思潮与上海现代儿童体育的开展。

上海是各种外国势力汇聚的半殖民地城市,也是中国人爱国主义情愫表现尤为突出的城市,这也反映在儿童教养中,由于意识到儿童是国家未来的国民,在教养儿童过程中尤其重视儿童体育的积极作用,注重塑造儿童的健壮体格和尚武精神。陈鹤琴提出“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要强身先要注意幼年的儿童”^[8],而儿童强身的途径就包括进行体育运动,尤其是西方竞技体育。陶行知提出“健康第一”,主张“体育为德智二育之基本”。

上海《勤奋体育月报》第1卷第1期“本报趣旨”指出:“强邻压境,国难当头,……为社会国家民族生存计,惟有加强锻炼国民体魄,积极注重国民体育训练,准备疆场强劲战士,养成雪耻报国的健儿……”^{[9]193-194}陈奎生认为体育军事化应从小学开始:“应使小学体育完全武化。一切教材,应多用跑、跳、攀援、腾越、投掷、爬伏、角力、相扑、游泳、警挥等等勇武的比赛,以锻炼儿童,使其身心强健,胆力宏大,脑筋细密,俾能忍苦耐劳,机警活泼……”^{[9]195}在体育救国思潮影响下,儿童体育广泛开展,运动项目也由传统的棋类、武术、踏青等转为跑、跳、投掷、游泳等现代运动项目。

在当时的上海社会,现代体育一方面解放儿童的身体,促进儿童体能的不断提高,另外还成为国家解放的重要路径,是中国摆脱半殖民地状态的方法。在这种社会氛围影响之下,上海的儿童也切身感触到这些时代特征。仁智勇女中附小的许学文在自己的文章中写到“自己所处的国家,是怎样的弱,……这国家所渴望着的是强健的儿童,将来长大了会为祖国打仗的儿童。”^③在1933年儿童节庆祝大会上,尚文小学儿童代表发表演讲号召儿童强身健体:“今天是儿童节,我们该知道现在在这国难当儿,更应当谋救国家的方案,虽然有所谓实业救国,然而总没有健康救国来得切实,因为有了强壮的体魄,不怕没有强壮的国家,这是积极的具体的良好办法,……欲谋国家健康,须努力与人民康健”。^④这反映出儿童自身对体育锻炼、身体强健和救亡图存关系的认识,反映出时代发展的要求与趋势。

20世纪20、30年代,上海发展成为中国贸易、金融、工商业、娱乐业中心,整合发展了城市功能,建立起相对完善的城市公共设施,也包括当时中国最为先进的体育设施。随着一大批学校操场、公共体育场、儿童游乐园等的创办,上海现代儿童体育蓬勃开展,并成为全国之翘楚。

2 1927—1937年上海现代儿童体育发展的历史

2.1 学校体育

1) 学校体育的制度化。

一定时期的教育总是服务于当时的社会发展，并根据社会所需进行调整。随着儿童本位和强国强种的呼声日高，社会对学校体育的关注增多，有必要对学校体育进行监管，“建立行之有效的规则制度，推进学校体育的规范化、法制化建设步伐”^[10]，到民国时期，学校体育被纳入中国教育体制之中，各种政策法规日趋完善。

南京国民政府在1931年制定、1936年修订的《体育课程标准》规定小学体育的目标包括：(1)发达儿童身体各器官机能良好，全身正常发育；(2)顺应儿童爱好身体活动的本性，发展运动能力，养成日常生活及国防方面必要的技能；(3)培养儿童勇敢、敏捷、耐劳、诚实、公正的精神……为复兴民族、防御外侮，准备御敌。小学低年级体育课每周150 min，中年级体育课每周150 min，后修订为160 min，每日清晨或晨间运动15 min，每日上午课间休息10 min，进行团体或个人活动^{[9]158-159}。突出强调两个方面，其一，体育是促进儿童身心发育的途径；其二，体育是复兴民族，抵抗外侮的手段。

体育是增强体质的教育，体育课“通过教学活动向学生传授体育基础知识和基本技术技能，通过体育课堂上具有一定运动负荷的身体活动，成为学生身体素质发展的重要途径”^[10]，学校体育的重要性愈加明显，对学校体育的管理被纳入教育体制之中。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体育行政组织均隶属各级教育行政机关：教育部设体育委员会，主管体育科及主管体育之督学；各省教育厅及行政院直辖市教育局设省市体育委员会，主管体育股及主管体育之督学或指导员^[11]。

依据这些政策措施，1930年上海市教育局订立中小学幼稚园暂行训育标准，注重中小学幼稚园学生的体格锻炼；1932年上海市教育局颁布《幼稚园儿童生活历》设计幼儿保育内容和方法，要求各幼稚园指导幼儿在活动中边做边学，将游戏、社会、自然等结合起来。上海市教育局规定小学教育应力求适应儿童身心，以启发其自动能力并培养民族精神，要求达到8项标准，其中第1条即是“培养儿童健康体格”，最后1条为“养成儿童爱国爱群之观念”。为达成这样的目标，幼稚园开设音乐、故事、游戏、工作等课程，小学教学科目有公民训练、卫生、体育、国语、自然、算术、劳作、美术、音乐等。

从这些课程设置来看，儿童学习内容已经超越传统常礼教的范畴，体现出解放儿童，以儿童为中心、

为现实服务的教育理念，体育课程的开设既促进儿童健康成长，也顺应了当时的体育救国思潮。体育课程的设置并不仅仅在形式上，上海市教育局还定期到各幼稚园和小学进行视察，如1928年第2学期，对沪南、闸北两个区的42所市立小学，视察体育课45次，^⑤及时发现问题并力求解决。这样，上海市幼稚园和小学体育课程的规章制度日趋完善，被合理纳入上海市教育的管辖范畴之内，并得到有效管理。

2) 上海儿童学校体育有声有色。

上海是当时全国文化中心，教育亦处于领先地位，尤其重视对初等教育的投入，1929年，上海的教育经费中，初等教育占到70%。相对充足的教育经费、繁荣的娱乐、先进的体育设施等使得儿童体育在幼稚园、各类小学中有声有色。

无论幼稚园的游戏、工作课，还是小学的体育课，都需要发行儿童体育教材。1920—1938年，上海出版了395种体育书籍，其中包括相当数量的小学体育读物。1933年，商务印书馆编印“复兴教科书系列”，包括《体育教本》，其中有蔡雁宾、沈百英编写的复兴初级小学本；商务印书馆还出版《儿童体育丛书》。1929年《申报》体育记者马崇淦成立勤奋书局，专门出版体育教科书、体育参考书，依据新课程标准出版一套《小学体育教本》10册和教授书3册。自1933年10月至1937年7月还发行4卷46期《勤奋体育月报》，这是近代颇负盛名的体育期刊，其中刊登100多篇有关中小学体育教材的文章。

1934年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小学初级《常识课本》中，涉及到儿童体育的有两篇课文，一篇《公共体育场》中写到“公共体育场，场地很大，天天有许多人，到那里去运动。”文字旁边还附有插图，一群儿童在体育场内荡秋千、滑滑梯、玩跷跷板等^{[12]37-38}。另一篇《童子军》课文写到“我们学校，有许多童子军，常常要操练，有时还要到野外去露营。”插图则是童子军练习搭帐篷和操练的背景^{[12]39-40}。

1928—1932年，上海6个简易体育场有5个设置在小学校园之中，占地面积约从1、3、4亩到17亩不等，资产共计约16270元。另据上海市政报告，1934年，上海市教育局在浦东的高桥小学建立第7简易体育场、在北新泾建立第8简易体育场、1935年，在龙华设立第9简易体育场。这些体育场也对市民开放，但“附设于学校者除例假全日开放外每日在上午八时后下午四时前不得入场运动妨碍校课”，^⑥首先是为了满足学校正常的体育教育，让儿童获得体育运动的资源。

自1928年11月至1937年5月，上海市政府共举办9届小学联合运动会，号召儿童进行体育运动，锻

炼健康体格。参赛学校最少时有 69 所,最多时达到 107 所,西城幼稚园、万竹小学等学校成为优胜学校。近代以来中国在同西方的竞争中屡次失败,受进化论“优胜劣汰”危机意识的影响,学校教育试图通过体育这样的方式干预儿童的身体,实现“强种”的目标,最终以完成国家独立的历史任务。

20 世纪 20、30 年代,由于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上海的学前教育 and 初等教育处于全国领先的地位,据上海市社会局的调查,1937 年,上海适龄儿童入学率为 59%,远高于同期全国适龄儿童入学率 30.88%^[13]。大多数上海儿童能够享受到学校体育设施,从事体育运动,41%的失学儿童则丧失了学校体育运动的机会,对于他们来说,可以通过各种社会体育方式和渠道进行体育活动。

2.2 社会体育

1)各阶层儿童广泛参与社会体育。

1927—1937 年上海处在剧烈变革时期,农业萎缩,工商业发展,新的职业日趋细化,社会分工的巨大差异导致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分化。依据占有社会资源的多寡,可将上海市民分为上中下 3 个社会阶层,官僚、士绅、资产阶级属于社会上层,职员等属于社会中层,工人、苦力等属于社会下层。

随着上海城市工商业的繁荣,城市的各项功能日趋完善,建立了大型的运动场、游泳池等。由于经济收入和闲暇时间的增多,中上阶层的市民有物质经济基础和时间进行休闲运动、体育健身等,其日常生活的西化也表现在体育运动方面。在这些家庭中,无需刻意追求体育对教养儿童的作用,观看比赛、踢足球、打网球、游泳等已经成为上层家庭儿童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家庭能够为儿童购买玩具并开展活动,或为儿童从事体育锻炼提供资源。

20 世纪 30 年代,上海永和实业公司生产的“永字牌”橡胶皮球行销全国,备受小学生喜爱。在《申报》、《东方杂志》等报刊中还经常出现儿童运动器材、运动衣的广告也主要是针对中上层家庭的。⑦报刊对现代体育的宣传促进了儿童体育与社会需求的结合,反映城市对于健全儿童的期望,体现体育对于儿童身体成长的重要性。

随着竞技体育逐渐为人们所熟知,上海经常举办或承办一些运动会,运动会门票价格适中,第 6 届全运会门票价格为:田径场普通券价从 2 角到 2 元不等,长期券价 8 元或 15 元。游泳普通券价 6 角到 1 元半不等,长期券价 6 元;排球、棒球、网球券价均为 6 角,篮球初赛 4 角、决赛 6 角。⑧这样的价格对于中上层家庭是可以接受的。20 世纪 20 年代中后期,上海

足球运动处在第 1 个高峰期。有些小孩子“花了两毛钱,买了最差的位子,挤在人堆里看了一场球”,看到“亚洲球王”李惠堂的比赛,被场上气氛吸引,从此“每逢礼拜天,就向大人要一元钱,三毛乘三轮,两毛买门票,五毛吃点心,同小伙伴一起,要么踢球,要么观看比赛,不到天黑不回家。”^[14]

上海还存在广大的工人群体,甚至有些儿童本身就是童工,处在社会底层的儿童也有机会参与体育活动。在年收入 200~300 元的上海工人家庭中,杂费开支到达 70.45 元,占到全部支出的 20.9%,杂费中包含教育、娱乐、交通等。年收入 200~300 元是较低收入群体,即便如此,这些家庭每年仍有 0.63 元的文化娱乐支出,能够让四口之家的家庭成员每年每人逛一次大世界,或听一次地方戏,也能够看一场运动比赛^[15]。为了促进儿童的健康成长,还提倡一些成本低廉的传统体育项目并举行比赛,如举行踢毽子比赛和儿童跳绳比赛^[16]。在儿童节和儿童节等重要节日期间,公园、儿童游乐场等免费向儿童开放,出版社免费向儿童尤其是社会底层儿童派发体育书籍、玩具厂赠送玩具等,这些措施使得下层儿童也能够体验体育运动。

此外,上海提倡童子军教育,1913 年成立了上海中华童子军会,1915 年第 2 届远东运动会在上海举行,400 多名童子军参加表演和检阅、进行各种服务工作。1927 年 6 月成立上海特别市童子军协会,1930 年 10 月又改为中国童子军上海市理事会,会所就在南市的公共体育场。童子军训练中注重儿童体育的应用,“以儿童本位之教育”为原则,⑨男童子军学习“游泳”,女童子军课程则包括“健身运动、远足”等。童子军经常进行检阅露营、课程比赛、野战等活动,1924 年 4 月上海童子军比赛,个人组分为“游泳、划船、射击、攀登、风筝音乐、娱乐、飞机模型、长距离自行车、无线电”等 10 项,⑩体育项目占到了半数以上。上海童子军还经常与西侨童子军进行足球年赛、联合露营、野战等。

增强体质、懂得竞争、寻求胜利等理念通过现代体育比赛传播给儿童,当中国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时,这些信息的传播对于抵御外侮发挥着积极作用。

2)现代儿童体育兴盛展现新式生活方式的到来。

从功能上看,最早出现在上海的跑马、溜冰、足球等体育运动是为了满足外侨生活需要的,是西方人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伴随着西方坚船利炮来到中国的西方体育,在当时还是先进生活方式的象征,这种生活方式代表着西方社会的强大与先进。20 世纪 20、30 年代的上海“有物皆摩,无事不登”,现代体育运动也成为一种“摩登”生活走入寻常百姓家。

上海民众广泛参与到各种体育运动之中。据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统计,1929年10月份上海各运动场的观众有6万多人,①11月份有27226人;②1931年4月19日上海市教育局主办第1次长程赛跑,观看者“男女老少当在十余万人以上”;③1934年在申园举行的埠际足球比赛,有观众15000人;④1935年10月10日第6届全运会在上海开幕时,当天中外参加人员计有10万人;⑤1930年7月至1931年6月,在上海第1公共体育场、第1—5简易公共体育场的活动人数中,儿童数分别高达153573、82064、15668、33542、47563、36139人,超过成年人参与活动人数之和^[7]。

另据对上海市立第1公共体育场的调查,1930年7—12月妇孺部活动人数达115845人,以儿童为主。1930年市立第1公共体育场的活动总数中,学界占34.2%,学界中儿童又占到70%。⑥儿童还参与一些大型运动会的表演项目,1933年,在南京全国运动会中,有2360儿童表演太极操;1934年儿童节,在南京公共体育场,有3000余儿童表演太极操;1935年在上海全国运动会上,有3000儿童表演太极操。游园也是上海儿童经常参与的体育活动之一,1929—1933年,仅公共租界兆丰、虹口、外滩3个公园,儿童游览人数累计突破55万人次^[8]。可以看出在日常生活中,上海儿童频繁出入各种体育场地进行体育活动,现代体育已成为儿童生活的一部分。

体育增强体质、促进健康的功效是无可否认的,但如果没有生活方式的改善,仅仅靠打球、做操等无法实现民族解放的时代诉求。现代体育是工业文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产物,上海儿童对体育的广泛参与,是上海工商业经济发展的结果,体现了人们从传统的农耕生活方式向西方现代生活方式的转变。儿童自觉地践行现代生活方式,才能突破传统生活方式的约束,铸造健康体魄和养成现代人格,实现自我提升和解放,并为国家、民族的解放奠定基础。

3 对现实的启示

通过对1927—1937年上海现代儿童体育的回顾,可以总结出现代儿童体育是一种遵循儿童生长发育规律和身体活动规律,通过身体锻炼、竞赛、游戏等方式达到增强体质、丰富生活、满足儿童身心需要为目的的特殊社会实践活动,能够促进儿童身心成长,锻铸健康体魄和人格,包括儿童体育运动和体育游戏。

1927—1937年上海现代儿童体育的开展,对于儿童实现身心解放、灌输民族观念、改造生活方式等方面具有促进作用,儿童的解放为实现民族独立提供生

力军,救亡图存的目标是当时时代的需求,为儿童的解放和儿童体育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现代儿童体育对于儿童解放和国家解放具有特殊意义,1927—1937年上海城市关注儿童身心解放和儿童体育,在促进儿童成长的同时,儿童体育自身得到发展,也给我们以启迪。

1)从实施原则看,儿童体育应尊重儿童自身特性,以儿童身心的愉悦为目标。儿童从事体育运动或体育游戏,通过身体锻炼、技术、竞赛、游戏等方式能够增强体质,能够打破对儿童生理和心理发展的束缚,使儿童身心获得解放。现代体育有利于儿童骨骼、肌肉的生长,是增强儿童体质积极有效的手段,有利于锻铸儿童健康体魄和人格。体育运动是儿童融入社会的重要方式,只有体现儿童的生理和心理特性的体育运动,才能调动儿童的普遍参与的积极性,只有让儿童主动从事体育运动,才能真正实现儿童身心解放和成长。

2)从方式上看,儿童体育运动方式应灵活多样,贯穿在儿童生活中。体育是儿童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学龄前儿童或者各种原因的失学儿童,体育是其接受教育的重要途径。学校体育和社会体育互为补充,体育馆、公园、游乐场等可以让儿童切实感触到体育的乐趣,并以此为契机接受教育,养成良好的行为方式、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团结进取的良好精神等。

3)从体育的社会功能分析,儿童体育应反映时代诉求。在近代中国半殖民地的语境下,儿童身体的强壮和建设民族主义国家被紧密结合起来,西方体育则成为联系二者的纽带,体育广泛出现在儿童的日常生活中,儿童的身体、生活等日常小事却书写着民族独立和国家解放的大事。儿童体育的发展不仅代表着西方现代生活方式在中国的传播与兴起,还成为先进中国人向西方学习、探寻强兵救国之路的途径。

4)社会进步与体育发展能够实现良性互动。儿童体育的发展得益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又能够反映社会发展方向,并根据社会的发展需求作出调整,合理引导儿童具备社会所需的基础技能,进而促进儿童的全面发展和社会潮流进步。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是不断变化的,当前中国社会处于全面转型时期,儿童体育应迎合社会发展和变革的需求,努力在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下把握儿童体育在内容、形式、观念等各个方面的更新完善,以促进儿童体育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推动社会的变革以及儿童的成长发育,最终儿童体育也将获得长足发展。

注释:

①上海市档案馆.档案号Q114-1-26,上海市政府秘书处.上海市政府公报[Z].1934(142)。

- ② 周作人. 儿童问题之初解. 绍兴县教育月刊, 1914, 3(6).
- ③ 《申报》, 1934年4月4日刊登。
- ④ 《申报》, 1933年4月5日刊登。
- ⑤ 上海特别市教育局. 上海特别市教育统计[Z]. 1928: 223。
- ⑥ 上海市立公共体育场规则, 上海市政法规汇编六集. 上海: 上海市政府, 1933: 61-62。
- ⑦ 《申报》, 1931年9月28日刊登。
- ⑧ 《申报》, 1935年10月1日刊登。
- ⑨ 《申报》, 1933年10月8日刊登。
- ⑩ 《申报》, 1924年4月25日刊登。
- ⑪ 《申报》, 1929年11月1日刊登。
- ⑫ 《申报》, 1929年12月5日刊登。
- ⑬ 《申报》, 1931年4月20日刊登。
- ⑭ 《申报》, 1934年2月19日刊登。
- ⑮ 《申报》, 1935年10月11日刊登。
- ⑯ 市立第一体育场提供的各部运动人数表及职业表[Z]. 上海市教育局业务报告, 1930: 20-21。
- 244-245.
- [5] 陈植. 造园学概论[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5: 186.
- [6] 鲁迅. 鲁迅文集[G]. 长春: 吉林教育出版社, 2006: 125.
- [7] 钱弗公. 儿童保护[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7: 3.
- [8] 黄书光. 陈鹤琴与现代中国教育[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8: 65-69.
- [9] 苏竞存. 中国近代学校体育史[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4.
- [10] 梁立启, 邓星华. “扬州会议的回顾”和对当前学校体育发展的启示[J]. 体育学刊, 2014, 21(5): 1-5.
- [11] 姜书阁. 中国近代教育制度[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5: 198.
- [12] 王云五. 常识课本[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4.
- [13] 中国文化建设协会. 十年来的中国[G].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7: 565.
- [14] 孙曜东, 宋路霞. 浮世万象[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4: 13.
- [15] 忻平. 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日常生活[M]. 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9: 266.
- [16] 国家体委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 中国体育史学会. 中国近代体育史[M]. 北京: 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 1989: 287.
- [17] 上海市地方协会. 上海市统计(教育)[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3: 20-21.
- [18] 上海市地方协会. 上海市统计(社会)[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3: 20.

参考文献:

- [1] 蒋梦麟. 西潮[M].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7: 159.
- [2] 寿尔. 田凫号航行记[G]//中国史学会.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八)),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386.
- [3] 成都体育学院体育史研究所. 中国近代体育史资料[M]. 成都: 四川教育出版社, 1988: 109.
- [4] 谭华. 体育史[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